

现代名著宝库

TREASURE-HOUSE OF
MODERN FAMOUS WORKS

鲁 迅 张恨水 等 / 著
茅 盾 徐志摩



延边人民出版社

现代名著宝库

第一辑

禹 裔 主编
齐豫生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桂镇教

现代名著宝库

(全二十辑)

禹 裔

主编

齐豫生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发行

印刷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 印数 1—2030 册

787×1092 毫米 32 开 260 印张 65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48—283—0/I·83 定价:1280.00 元

现代名著宝库编委会

特邀顾问:蒲健夫

周文姬

主 编:禹 裔

齐豫生

副主 编:王茁芝

沙 文

编 委:周广宇

周兴华

杨泰峰

潘启龙

潘国平

田 爽

尹建军

丁 妞

朱汉军

常 桦

殷奎光

李克勤

文玉俊

彭新岸

曹振亭

唐向东

雷玉东

陈淑惠

钱涵谷

耿玉鸣

郑乾坤

黄绍文

高文秀

朱文澜

段秀章

吴诗文

夏云淳

校 勘:艺文堂

版式设计:博 乐

排 版:张 丽

汤小琴

王一帆

前 言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诞生了很多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历经几个世纪的沉寂和饱尝 100 多年的屈辱后，以觉醒了的巨龙雄姿在太阳升起的地方重新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壮丽景观。

作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道前进，并成为他的一条战线的中国新文学，自始至终贯串着时代的主题，肩负着时代赋予作家、文学家们的神圣使命，用时代的最强音，为民族的生存、自由、独立、解放而呐喊。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展示的不仅是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和规律，更多的是中华儿女为民族生存、独立而抗争，为民族的发展而勇于追赶和创造世界潮流的悲壮历程。广大文艺作家的创作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深刻地展示了中国人民告别愚昧、麻木，走向觉醒、抗争，并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而且作家的创作也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到处存在着值得一写的伟大而丰富的素材而不断得到深化和提高，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诞生了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李劫人等世界级文学大家，涌现出《呐喊》、《女神》、《家》、《四世同堂》、《死水微澜》等超越前人、启迪后代的不朽经典之作。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新纪元，也是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喜事。

中国现代文学孕育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种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因素中,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中产生,并随着政治革命的进程而深化、发展,其间的历程曲折复杂,充满着大痛苦、大欢乐、大胜利、大挫折、大进军、大迂迴、大喜大悲、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这是历史赋予这一大变革、大创造时期的时代特征,其间蕴藏着很多丰富的,值得珍视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跨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是多么值得去了解、认识、思考和总结。

在民族救亡运动中孕育,与思想 革命同向,与政治革命认同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孕育、积累,乘着思想革命的东风、厚积博发而形成的人类文学史上的奇观。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告别古代而跨入近代,这段历史是段巨变的历史,其间充满了血泪、屈辱,流淌着四万万生灵的哀鸣和痛苦的呻吟,但也到处弥漫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不可避免地要与时代接轨。尽管暮气攻心的古典文学仍然占据着文坛,并一度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以“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伦、薛福成)及友人为骨干的“桐城派”古文的中兴,诗坛上还横行着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但伴随着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文学的近代化口号也不断地被提出来,太平天国提倡“文以纪实”;王韬、冯桂芬等中国早期新闻工作者根据新闻写作需要而力倡报章体,“不信义法之说”,主张采用内容广泛,抒写自由,不受陈法约束的新体散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不仅给盛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同光体诗以有力的一击,而且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

成为许多读者和作者竞相效法的典范。

在古典文学近代化和为现代化作准备的进程中,梁启超的贡献非常巨大。作为维新运动的骨干人物,他不仅目睹了中国拥有亚洲最强的舰队而惨遭甲午海战失败的事实,而且亲历了“百日维新”失败的惨痛及“帝党”与“后党”之争。这些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仅有军事上的变革并不能救国,仅有政体上的变革也不能救国,虽然他不可能像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那样明确地提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主张,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认识也远不可与鲁迅等同日而语,但他至少清楚地认识到古典文学已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痼疾,因而梁氏非常激进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并以其典范的创作开创了一代新文体:“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其文、其主张在广大读者、作者、学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界革命”号召下,“报章体”、“时务文”、“新民体”等与梁启超有关的新文体不断受到人们的青睐,很多人开始用这种文体写作,出现了由古文向白话文过渡的可喜局面。而梁氏的“小说界革命”更鼓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引起了小说观念的巨大变化,促成了一大批新小说的产生,著名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就是小说观念变革的结果。小说的繁荣又产生了市民文学的主要流派“鸳鸯蝴蝶派”,出现了 20 世纪初市民小说的大繁荣。

与此同时,随着大批留学生走出国门、走向海外,西方文艺的面貌展现在他们眼前。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于是一些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理论、文学作品,被他们翻译过来,尽管还来不及认真比较、选择,还显得有些杂乱,但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成了文学

革命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翻译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著作时，西方话剧也开始被引进，尽管这些没有剧本的“新戏”、“文明戏”有诸多不足，毕竟从此有了中国的话剧运动，并促成了市民文学的繁荣，从旧戏的市场中争取了很大部分观众。

黄遵宪、梁启超等反对古典文学的先驱者们的惨淡经营，为一场千年一变的文学大变革的准备工作拉开了序幕，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 20 世纪大变革前的过渡时期，各种变革因素在其中孕育，各种变革力量在其中不断地积聚能量，候机裂变。所谓黎明前的黑暗者，必将成为光明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从 20 世纪的第一年开始，到 1917 年文学革命的爆发，完成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市民文学的繁荣，用一种半新半旧的东西抢占了主流文学的地位，把古典文学挤向时代的边缘。二是培育了新文学的创造者和接受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前驱们都在这一新旧过渡时期积聚能量、等待爆发。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革命的爆发、现代文学的产生仅仅有上面这些因素还远远不会实现。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要实现千年一变，还必须特殊的促成其裂变的政治社会历史背景，而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恰恰又为这场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提供了一系列充分必要条件。

1912 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甩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这一惊喜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与此同时，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纷争四起，终于在 1914 年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幕，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之久，不仅从客观上使列强无暇顾及远东事务，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这次大战也使列强大伤元气，很多有远见的中国人依稀看见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希望。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抓紧大战契机取得了较高速度的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提供了物质和阶级的基础。而此前迫于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压力，晚清政府也

实行了废科举、兴学堂，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这些举措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新式文化教育得到了发展，且具有相当的规模，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涌现出来，他们成了这场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急先锋。辛亥革命后，虽然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但随着他的帝制复辟化为南柯一梦，不仅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的大一统思想局面土崩瓦解，而且伴随着袁世凯的一命呜呼，树倒猢猻散，中国又陷入了军阀割据，武人争雄的局面，大小军阀忙于彼此之间的争战，此消彼长，政局混乱，来不及进行思想上的奴役和控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自由的局面，这一局面延续到 20 年代末。同时从 19 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出版、印刷业也得到飞速发展，一大批报刊、杂志相继问世，晚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也实行了稿酬制和版税制，颁布著作权法，使大批知识分子在废除科举，不再有“学而优则仕”的希望之后，能另辟蹊径，专门从事创作，藉以谋生。社会上出现了大批自由撰稿人和职业作家，这一重要群体的出现对现代文学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无论是外部社会条件，还是文学自身积累的内部条件，都为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的破土诞生做好了准备。混乱的政局和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思想氛围有利于人们突破常规，对传统进行大胆反省，有利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接受中国人的认识、了解、比较、选择，知识分子的眼界空前地拓宽了，认识也得到了升华，许多知识分子都目睹了洋务运动的勃兴，甲午战争的惨败，维新运动的流产，更目睹了义和团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止住八国联军的硝烟，而辛亥革命的惊喜旋即又被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的闹剧所驱散，中国依旧处在黑暗中、水深火热之中。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警醒，促使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不断地深入，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事不能救国，仅仅改良政体不能救国，而即使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有的帝制，也不能保证革命果实，因此，必须追赶世界潮流，培

养和塑造新一代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大众,即实现人的思想的现代化,才能保证政治的现代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能外御列强,内图自强。一场千年一变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已如箭在弦,势在必发了。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新文化的六种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稳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种精神归结起来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他不久又痛切地指出“亡国灭种之根在于卑劣无耻退蕙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力倡“民主”和“科学”,并将其比作舟车之两轮,无此两轮则社会无以进步。于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改造”被提到关系民族命运的高度上来了。

1916年,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聘请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留美归来的胡适为教授,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一批主张文学革命的人物都为蔡元培罗致做了北大教师。同时北大教师中也有拖着辫子以复辟自居的辜鸿铭,拥袁称帝的刘师培、黄侃等。蔡元培的这些举措符合思想、学术发展的规律,因而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新思潮的传播,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也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对20世纪一、二十年代思想界空前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伴随着蔡元培的一系列改革,北大也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府。

随着陈独秀受聘于北大,《新青年》也随即迁往北京,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都成了《新青年》的编委,一大批主张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她的周围,《新青年》已成了事实上的发

起新文化运动的喉舌，文学革命终于爆发了。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2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问世，千年一变的文学大变革正式拉开战幕。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力倡“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从“八事”入手反对文言文，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猛烈地抨击社会上流行的文言文的文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作者纷纷撰文拥护胡适的主张，猛烈的批判矛头直指当时盛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和“文选派”古文，斥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立场鲜明地扛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像一颗重磅炸弹，猛烈地轰炸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封建正统文学观念更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犹如夜空上两只展翅翱翔的雄鹰，惊醒了河山大地的宁静，在文学界、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文学革命轰轰烈烈地向纵深方向发展。

文学革命包括文学形式的革命和思想内容的革命，即语言上的革命和思想上的革命。由于陈独秀并不是作家或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所以他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后并没有发表多少关于文学的言论。而在这方面的言论较多且产生广泛影响的莫过于胡适和周作人。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胡适又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论新诗》等颇具煽动性的文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认为白话文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自《诗经》以降，凡有价值，有生命的都是用白话或近于口语创作的作品，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用白话文

写诗写散文、小说,并发表学术专著《白话文学史》,宣传其白话文和语言革命的主张。如果说胡适的言论更偏重于语言形式的革命,那么,周作人关心更多的则是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对思想革命更加关注,他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指出“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呢?”只有思想改革了,文学革命才算是完全胜利。而思想改革即是人的观念的变革,人的思想的解放。而怎样实现人的观念的变革、思想的解放呢?于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现代化”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欧洲关于“人的发现”,早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得以普及,在中国却得从头做起。“生了四千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是可笑的事。”主张文学创作要体现人道主义,反映人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反映“灵肉一致的生活”,这为文学革命中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随后他还发表《平民文学》,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不同点在于“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 and 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这些主张对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为人生派”、“为艺术派”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适和周作人的言论在当时具有导向性作用,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纷纷撰文讨论,将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革命推向高潮。

但是,新文学仅仅停留在讨论或理论的建树上是远远不足以推倒旧文学的,她必须诞生出能证明自己身份和健康成长度的作品,才能使旧文学自惭形秽,自感末日已经到来。

历史要求先驱者们在很短的时间产生出足与占据文坛数千年的文言文相抗衡的作品,实现千年一变,实在是太无情了。然而,有非常之人,就必定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势必成非常之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既然造就了一大批敢于离经叛道的人,那么这

些离经叛道的人势必要做出离经叛道之事。1917年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向古典文学发出了破天荒地的第一声呐喊,宣告了现代文学的诞生。《狂人日记》不仅在思想内容上猛烈地抨击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指出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掀翻这人肉筵席的呼声,充分体现了“人的觉醒”“人的发现”等文学革命主张,而且《狂人日记》在白话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十分精熟的地步,充分显示了白话文比文言文更能充分地表达作品思想内容的明显优势。《狂人日记》的发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技巧、纯熟的白话语言的完美结合,为新文学送上了一份奠基礼。此后用白话写作的一些新诗、新散文、话剧、小说闪亮登场,白话创作开始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诗歌方面,1917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以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纷纷成为新诗的作者,一些杂志和报刊纷纷开辟新诗专栏,新诗创作由附庸而蔚为大观。1920年3月,胡适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虽然“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虽然“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但毕竟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引起了很大反响,短期内多次再版。此后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以及周作人、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集相继问世。特别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狂飚突进的激情,高唱自我解放、民族觉醒之歌,奠定了新诗浪漫主义风格的基础。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诗坛上也出现了以李金发为首的现代派诗歌,经过30年代的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穆木天等人的推波助澜,曾一度在诗坛上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白话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向古典的文言文发难所采用的议论性散文大多用白话写成,很多文章成了初期白话散文创作的范例,如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议论性散文。1918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

期开辟了《随感录》专栏,随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新生活》、《新社会》等报刊杂志也相继开辟了《随感录》专栏,这些专栏为“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散文,特别是杂文的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陈源、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不仅是很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更是有影响的高产作家,《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揖主义》等文章,以及鲁迅的杂文是此时期最有影响的杂文。由于初期的杂文以宣扬新思想,批判旧文学,鼓吹文学革命为己任,往往擅长驳论,锋芒毕露,因此后来鲁迅比之为“投枪”、“匕首”。除杂文而外,周作人、朱自清、冰心、许地山、梁实秋等人的风格闲适的抒情、叙事、游记散文也颇见功底,这样散文也伴随着文学革命的不断深入,奠定了最初的实绩。

小说方面,出现了反映文学革命主张,描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问题小说的繁荣,著名的问题小说如胡适的《一个问题》,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贞女》、《玉君》,俞平伯的《花匠》,汪敬熙的《雪夜》,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这些小说都是针对某个问题,通过塑造某个普通人的形象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而初期的小说创作也并不拒绝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小说的加盟,事实上郭沫若的《牧羊哀活》,汪敬熙《砍柴的女儿》、《死与生》也堪称初期此类作品创作的佳品。

在戏剧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剧,虽然此时先驱者们更多的是致力于戏剧理论上的建树,集中火力展开对传统戏曲的批判,但也忘不了戏剧创作实践的探索。先驱者们一方面猛烈地抨击旧戏,另一方面又广泛地介绍西方戏剧观念(尤其是悲剧观念),介绍西方剧作家及其作品,“五四”前夕,西方著名戏剧家易卜生及其作品颇受大众欢迎,1918年6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被辟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都在短时间里被介绍过来。“易卜生主义”在整个戏剧领域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整

个新文学界一股很有影响的思潮，推动了初期问题剧创作实践的发展。1919年3月，胡适的《终身大事》在《新青年》上发表，虽然该作带有明显模仿《玩偶之家》的痕迹，但毕竟使中国话剧告别了“幕表制”的时代，走向了依靠剧本的时代，中国话剧从此开始了自己新的发展历程。

文学革命的深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白话文学要代替占据文坛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必然会遭到大批遗老遗少的反对，新文学阵营与封建旧文学阵营的斗争不可避免，攻击新文学“数典忘祖”、“偏激”、“过激”、“矫枉过正”，要求“保存国粹”，倡言“圣人之道”的守旧派言论纷至沓来。1919年春，曾在介绍西方文学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文言小说和《致蔡和卿太史书》，《荆生》用影射手法攻击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污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文学革命主将是“伤天害理”、“背天反常”之“人间怪物”，他们的言论尽是些“禽兽之言”。《妖梦》和《致蔡和卿太史书》则攻击蔡元培先生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斥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斥白话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内部的守旧派人物刘师培、黄侃也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办起了《国故》，抵抗新思潮。

面对着守旧派的“八方非难”，陈独秀作《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李大钊作《新旧思潮之激战》予以猛烈回击，严厉谴责守旧派的历史倒退行为。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新青年》还将林纾含沙影射文学革命领袖的《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由于林纾等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理论上的力度，只是“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对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联合抗争，保守派遭受了惨痛的失败。

1919年5月4日，内忧外患交织的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

四运动”。这场运动如狂风暴雨席卷全国，深入发展为各行各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受到沉重打击。这场运动又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面对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守旧派深知螳臂挡车已经无济于事了。《新青年》自1918年第四卷第五期起，全部改用白话文，同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诞生，亦全用白话文。随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那些最持重的大报刊如《东方日报》、《小说月报》也都采用了白话文，而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白话副刊。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采用白话文。白话文在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中终于取代了文言文。

文学革命的浪潮远远超出了大陆范围，波及到台湾和海外侨胞中，1919年台湾留日学生组织“应声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声相应。1920年后，台湾也有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协会，并有了白话文研究会的组织。随后大陆的新文学相继传入台湾，台湾也产生了现代文学，出现了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奶母”的赖和，以及张我军、杨逵、吴浊流等重要作家。

在文学革命不断战胜守旧派的非难，创作不断取得实绩的同时，新文学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由于参加文学革命的成员并非纯然一色，他们中有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白话文等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学的过程中结成了坚实的同盟。但是，推倒旧文学之后，在对于什么是新文学，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学，以及怎样建设新文学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新文学队伍的分化。

由于在文学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占地

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地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传播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团体纷纷成立。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分担心这一切可能导致新文学、乃至整个中国走上一条与自己的理想相悖逆的道路,感到有起来抵抗的必要。1919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系统地宣扬实验主义哲学,并邀请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进行长时间的讲学和考察,随后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此,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之文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由于论争的双方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这场论争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分裂之势已现端倪。1920年11月,胡适致函《新青年》编委,认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后来胡适退出《新青年》编委,于1922年另办《努力》周报,宣扬“整理国故”去了。此后,随着新文学阵营内部分裂的加剧,原先同为向旧文学发难的战友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论争,如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批判《西滢闲话》,与“新月派”的论争,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等。这是历史的悲剧,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然。

总之,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的最终结果是带来了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它在文学观念上,将“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传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和消极意识加以否定,使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的积极进取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广大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创作倾向。在思想内容上,闪耀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充溢着觉醒了的时代精神。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国外多样化的文学样式和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人民大众,创造了既与世界文